

试论河间学派发生及其嬗变的相关因素

★ 焦振廉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 西安 710003)

摘要:本文就河间学派发生与嬗变的相关因素进行探讨,认为学派的嬗变不是简单发生的,影响学派学术嬗变的重要因素包括传承、改造、因势、融合、引入、实践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河间学派;嬗变;相关因素;各家学说

中图分类号:R -09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ed Factors of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of Hejian School

JIAO Zhen-lian

Shanxi Provi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the Institute of Document Information Institute, Xi'an 710003

Abstract: Discus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about school of Hejian. Believes that it is not occurrence easily about the evolution of school and it including several aspects as following: inheritance, transformation, elements, integration,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Hejian school; Evolution; Various schools

学派是在某类学术内部的不同观点、思想、方法及其提出者和传承关系的集合。一般来说,学派是由不同学者在本学科领域提出针对某个方面不同见解,于是倡说己见,或著书而后人私淑其学,或授徒而门人传承其术,而后形成流派。如刘完素倡说六气皆火、五志化火,有葛雍等从学于当代,又有张子和私淑于后来,更有朱丹溪远绍于元代,构成了河间学派的基本流衍过程。

学派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嬗变过程中的。一般来说,学派的继承者与其开创者的观点多少会有所差异。如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倡“君子之儒”,注重人格修养以及西周礼仪的保存与恢复,而至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孟子基于当时社会的现状而提出针对封建统治者的“仁政”观点。尽管孔、孟皆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孔子去世后,儒学分为八家,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至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孟子之儒(出子思之儒)和荀子之儒(即孙氏之儒),不仅两者大有不同,以至荀子的弟子李斯和韩

非实际已属法家一派了。因此,学派的嬗变不仅是可发生的,而且有时是很显著的,乃至可以创立新说别立一派。在金元医学流派中,刘完素以“火热论”开河间学派,一传于马宗素及荆山浮屠等,荆山浮屠再传罗知悌,宋濂称罗知悌“得金士刘完素之学,而旁参于李杲、张从正二家”^[1],可知刘完素之学传至罗知悌已有所不同。至朱丹溪,刘氏的“火热论”已变为朱氏的“相火论”。另如张从正,依刘完素之说而尤倡汗下吐攻邪之说,刘氏“实火说”已变为张氏的“实邪说”。

将刘完素、荆山浮屠、罗知悌、朱丹溪以及张从正统归为河间学派,是基于学术的传承以及类同的一面,而从实际的情况来考量,张从正之学与朱丹溪之学实在距离较大,两人虽皆传刘完素之学,但又不仅仅是其学术的传承者,在传承的基础上还进行了改造,而分别创立“攻邪”、“滋阴”之学,因而实为基于刘完素之学的新学开创者,至少在河间学派中拥有“子学派”的地位。于此亦可见学派嬗变之一斑。

学派的嬗变不是简单发生的,其中重要的因素有传承、改造、因势、融合、引入、实践等方面。

1 传承

传承是学派发生的基本要素。传是传授,是师之于弟子;承是继承,是弟子之于师。学派通过传承,其学术观点和方法得以延续和流布。因此,没有传承关系便没有学派的发生。由于中医学术的传统性及经典的权威性,“继承”首先是相对于早期经典而言的。若没有对《素问》、《灵枢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所承载的基本学术的继承,后世的学派便无从谈起。古时以学术名家者无不有所依据,所以朱丹溪说“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2]。《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属五脏者各1条,属上、下者各1条,属湿、风、寒者各1条,属火者5条,属热者4条。刘完素得此启发并以之为“火热论”的基础,继承自己在其中。朱丹溪倡“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称“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脏腑者乎”^[3],仍然首先是对经典的继承。这种对经典的继承在学派中对于师和弟子都不能例外。其次,“继承”还在于弟子(或私淑者)对乃师学术的继承。刘完素弟子马宗素著《伤寒医鉴》,全书以“论”名篇,每论先列朱肱《活人书》观点,次以“守真云”列刘完素论说,殿以《内经》原文,以批驳朱肱之论,力倡乃师学术。张从正私淑刘完素之学,其《儒门事亲》对刘氏推崇备至,不仅随处引用刘氏医论方药,并称“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刘河间一人而已”^[4],因而《金史》称张从正“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5]。

2 改造

改造是针对原有理论、观点而言的。学派开创者如果照搬经典理论,则不足以创立学派,学派传承者若囿于师说而无所改造,则无所谓学派的嬗变。从河间学派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其开创者刘完素,还是其传承者罗知悌、朱丹溪,皆一面宗承前说,一面又对前说进行改造。《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属火者5条,属热者4条,所涉病证仅诸热脊痠、诸禁鼓栗,如丧神守,诸逆冲上,诸胀腹大,诸躁狂越,诸病有声,鼓之如鼓,诸病附肿,疼酸惊骇,诸转反戾,水液混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等十余条。刘完素将之增益至50余条,大大扩充了火热病的范围,从而奠定了“火热论”的理论基础。唐代陈藏器提出“十剂”说,对补剂的阐释为“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6],显然指一般理解的温补方法。张从正则曲折辩说,强调“五脏各有补泻,肝实泻心,肺虚补肾……酸苦甘辛咸各补其脏”^[7],实际改造了传统对“补剂”的认识。另,“相火”一词早

见于《素问》,但主要指与三阴三阳相应的六气之一,即所谓“少阳之上,相火主之”^[8]。朱丹溪倡“相火论”,认为“相火”主要指人体中藏于肝肾之阳火,称“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9],显然改造了《素问》中“相火”的概念。

3 因势

学派的创立与嬗变,往往因人、时、地的条件或需要,即外部的因素是促成其说的重要条件。刘完素“因《素问·至真要论》详言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理,而以病机一十九条附于篇末,乃于十九条中采一百七十六字,演为二百七十七字,以为纲领,而反复辩论以申之”^[10],遂创“火热论”。至明代,张景岳对之攻讦甚厉,认为刘完素之法戕害阳气,殊为不妥,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则比较公允,认为“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醴,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又完素生于金时,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亦异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论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皆能应手奏功。其作是书,亦因地因时,各明一义,补前人所未及耳”^[11]。刘完素与张景岳学术的不同可以不论,但于此可知学派的创立与嬗变有一定外界因素的促成。由于南北“风土原殊”,所以“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而结果“皆能应手奏功”。所谓“因地因时,各明一义”,正道出了学派发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另,将张从正与朱丹溪相较,可以发现两人所经治患者每多不同。张从正尽管曾“召补太医”,但不久即辞去,其间原由殆与其汗下吐法不合达官宦宦之体质及所好有关,而从《儒门事亲》所载医案看,张从正所治患者多为中下层人,即所谓“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朱丹溪初从理学家许谦,而许谦在当时名声甚著,以至“及门(谓做弟子)之士著录者千余人”^[12],朱丹溪却是唯一列入《元史·许谦传》附传的,并称朱丹溪“清修苦行,绝类古笃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13]。元末戴良称朱丹溪“在婺得道学之源委,而混迹于医。或以医来见者,未尝不以葆精神开其心。至于一语一默,一出一处,凡有关于伦理者,尤谆谆训诲,使人奋迅感慨激厉之不暇”^[14],其所交接者自多显贵可知。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孙一奎《医旨绪余》称“丹溪生当承平,见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复用刚剂,以至于毙,因此救时之说”^[15]。于此可知学派之创立与嬗变,与人、时、地等外部条件或需要有关,医家的观点或

思想多是“因势”而出,亦“因势”而成的。

4 融合

“融合”是指学派的学术在流衍过程中将其他学派或医家的观点与之融合交通,从而使原有的学术发生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性质上的变化。刘完素创“火热论”,为河间学派开山,经荆山浮屠而至罗知悌,经罗知悌而至朱丹溪,已演变为“相火论”。若两相比较,前者多主外邪实火,因而治疗“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皆能应手奏功”^[16],后者则“意主补益,故谆谆以饮食色欲为箴,所立补阴诸丸,亦多奇效”^[17]。引发这种变化的因素自不是单一的,学派学术在流衍过程中融合其他学派或医家的观点,是重要因素之一。朱丹溪从学于罗知悌,称自己“得罗太无讳知悌者为之师,因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18],而罗知悌“学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19],朱丹溪拜罗知悌为师,后者“授以刘、李、张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20],可知刘完素之学传至罗知悌,已融合了张、李二家之说。迨至朱丹溪,更发扬而光大其融合各家的精神,终成“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相火论”而重开天地。朱丹溪在《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中记述了罗知悌治疗一病僧的医案,先“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烂与之”,而后“与桃仁承气一日三帖下之,皆是血块痰积”^[21],而自己治疗“叶先生患滞下后甚逼迫”之病,则“与参、术、陈皮、芍药等补药十余帖,至三日后胃气稍完,与承气两帖而安”^[22],可见河间之学传至朱丹溪,一面守其宗绪之旨,一面融合李东垣、张从正各家之长。因此,清人评价说“完素主于泻火,震亨则主于滋阴。虽一攻其有余,其剂峻利,一补其不足,其剂和平,而大旨不离其渊源”^[23]。

5 引入

“引入”指将原与医学无关或关联甚微的理论或观点引入医学以为说理的依据。在此一方面,朱丹溪最具典型性。朱丹溪从学于许谦而后习医,虽“竟不以儒名而以医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其内心不仅始终持守着理学的情结,而且将理学的观点引入医学,并作为其学术的依据。北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被后世推为理学之开山。戴良称朱丹溪“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24],朱丹溪则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

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25]关于“相火为元气之贼”,朱丹溪说:“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谓之动者,即《内经》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周子又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此善处乎火者。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26]因此,因为“五性感物而万事出”,于是“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以致“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但若“人心听命乎道心”,则“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反之则可能成为“元气之贼”。朱丹溪还说:“先儒谓物物具太极,学者其可不触类而长,引而伸之乎?”^[27]朱丹溪是杰出的医学家,同时又力图引入理学的观点来阐述医学的道理,从而为“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找寻哲学层面的支持和依据。

6 实践

中医是基于实践的医学,所有理论观点必得实践的检验而后可以流布并发生影响。在金元医学流派的发生于嬗变过程中,医家的实践活动是极其重要的。在刘、张、朱三家中,刘完素医案最少,《金史》称他“尝遇异人陈先生,以酒饮守真,大醉,及寤,洞达医术,若有授之者”^[28]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自序》中说自己此后“衍其功疗,左右逢原,百发百中”。所谓“遇异人陈先生”或涉虚诞,但“左右逢原,百发百中”则从侧面反映了其精于临证实践的真情。因此,刘完素精于临证无疑,但其医案今多不传。张从正“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29],其医案集中在《儒门事亲》中,该书共载张从正医案约200则,其中卷六至卷八为“十形三疗”,载案160余则。朱(下转第35页)

四是对情志病人。万老常说,心病还要心药医。对于某些情志因素引发的疾病,除了正常的情志疏导之外,主要可针对情志疾病对心、肝、脾系统的影响。提供以泻心火清心神、疏肝郁平肝阳、扶脾土散胃火为目的的指导原则。从而达到协调脏腑、平和情志的作用。

五是对老年病人。随着我国老年化社会的提前到来,老年病患者的临床养生问题将会日益彰显。万老认为,老年患者的养生指导关键要抓住两点:一是要正确认识生命的衰老与死亡现象。生、长、壮、老、已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不为生命的衰老而悲凉,也不为生命的最后结束而恐惧。乐天知命,快乐地走好每一天。二是正确对待人生的得失。孔子讲:“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实在是古人的阅世经验。人到晚年,一切的名誉、地位、财货,实已无足轻重,不必挂怀,只有安度晚年,才是清福。

2.2 辨体质 万老认为,明辨患者体质,是正确分辨阴阳,预知疾病阴阳转化、传变之机的捷径。如阴寒体质者患病多从寒化,虽感阳邪,亦不宜过用寒凉,应预见其耗气转阴的可能;阳热体质者患病多从热化,虽感阴邪,亦不宜过用温热,应预见其伤阴转阳的可能。是故先生临证特别注重对每一个患者体质情况的了解。如冬夏所苦、饮食喜恶、尿尿质色等等,从中甄别其人体质的阴阳,以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可能趋势,从而在治疗过程中注意防范,预为调

(上接第31页)丹溪医案则比较分散,今传有明初戴原礼所辑《丹溪医按》,载朱丹溪医案345则。但朱丹溪医案远不仅《丹溪医按》所载,如《格致余论》载案47则,见于《丹溪医按》者仅5则;《局方发挥》载案10则,见于《丹溪医按》者仅4则。明代楼英纂《医学纲目》,载朱丹溪医案超过450则。笔者曾辑录朱丹溪医案,即去其重复者,仍得700余则。当然,名家医案或有后世孱入者,但亦有湮没不闻者。仅存世医案已足以证明实践是中医学学术的基础,也是医家或学派观点发生及嬗变的基础。正因为临床实践以及实际疗效的支持,医家或学派的学术才得以成立并发生影响。

综上,河间学派自刘完素而至朱丹溪,其学派的学术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表现为一定的流变性。将刘完素、荆山浮屠、罗知悌、朱丹溪以及张从正统归为河间学派,是基于学术的传承以及类同的一面。但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三人之学实际存在着较大差异。张从正基于刘完素之学而自创攻邪一派,朱丹溪引入理学观点而成滋阴之学。河间学派的学术

缪。如其人素体形寒易感,是为卫阳虚,治病时必须注意在攻邪中扶助卫阳,以标本兼顾。如其人素体纳少便溏,是为中阳虚,治病时必须注重补脾,脾气旺则有力抗邪。更有一种阴阳气血俱亏,五脏六腑多病之人,体质羸弱,用药稍偏,即不接受,俗话说“按得头来脚又翘”,最是难治。此时掌握患者体质就有重要意义,一般采用平性药物,择其关键之处入手,可取稳效。

在了解体质时还要注意排除假象。由于中医学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因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少患者常能判断自身是“火体”或“寒体”,医者不可轻易附和,必须仔细询查,方能判定。因为患者毕竟不是医生,他们只能凭感觉而意会,不能洞察本质,有时难免得出错误甚至相反的结论。因此,体质调查其实贯穿于诊察的全过程。

2.3 重脾胃 在脾胃的生理方面,先生强调两点,一点是“脾胃为元气之本”,另一点是“脾升是升降运动的关键”。实际上是对东垣《脾胃论》的发挥。

对脾胃的病理,万老强调要注意“气火关系失调”和“升降运动失常”两个方面。气火关系失调是脾胃病理的一大特点,由李东垣首先揭示,万老将其条分缕析,使之易学易用。升降运动失常是脾胃病的基本特点,万老把东垣的主升与叶桂的主降结合起来,使之完善,颇便于临床运用。

(收稿日期:2009-08-01)

在传承中嬗变。学派的嬗变不是简单发生的,影响学派学术嬗变的重要因素有传承、改造、因势、融合、引入、实践等方面。

参考文献

- [1]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朱丹溪医学全书),2006:225.
- [2][3][9][18][21][22][25][26][27]朱丹溪.格致余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朱丹溪医学全书》),2006:3、25、7、3、29、14、25、25、27.
- [4][7]张从正.儒门事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子和医集),2006:60、25.
- [5][28][29]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11、2811、2811.
- [6]唐慎微.证类本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38.
- [8]证类本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69.
- [10][11][15][16][17][2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349、1349、1353、1349、1353、1354.
- [12][13]脱脱.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4320、4320.
- [14][19][20][24]戴良.丹溪翁传[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朱丹溪医学全书),2006:231、228、228、228.

(收稿日期:2009-11-20)